CHINA US FOCUS DIGEST

中美聚焦 文摘

2021 年 1 月号　总第 14 期

峰回路转

ISSN 2414-0783
9 772414 078005

CHINA US FOCUS

出 版 中美交流基金会

主　　席　董建华

发 行 人　黄德荫

主　　编　张　平　常　虹

顾　　问　朱英璜

编　　辑　彭　慧

《中美聚焦文摘》是一份双月刊杂志，刊登中美两国具影响力的领袖和学者有关两国相关议题的评论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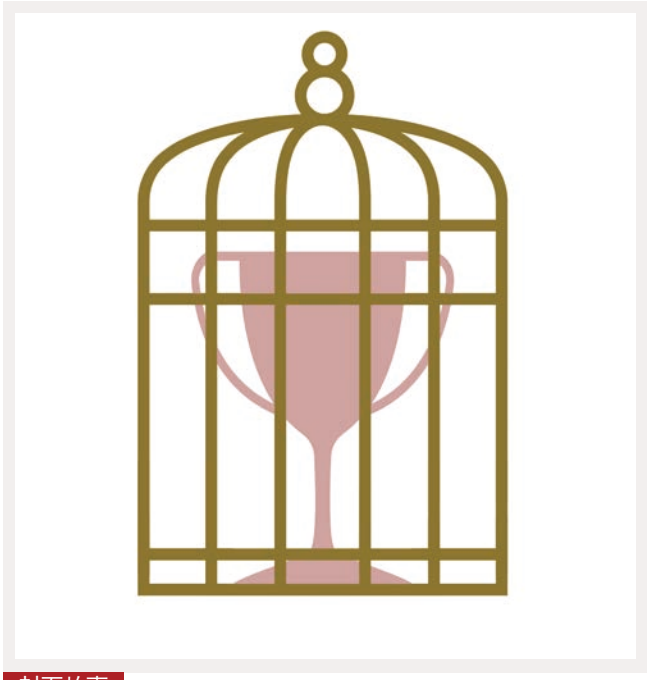
您的意见和建议，请电邮至
digest@cusef.org.hk

公司地址　香港上环干诺道西 3 号亿利商业大厦 20 楼
电　　话　(852) 2523 2083
传　　真　(852) 2523 6116

cn.chinausfocus.com
关注 Facebook 和 Twitter：@ChinaUSFocus

特别鸣谢

Chatham Strategies 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鼎力支持



封面故事

P06 **把竞争关进笼子**

何亚非

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框架，使中国和美国能够无歧义地在其中共同运作。两国只要愿意抓住这一时机，就可以造福当今世界。

P10 **对话傅高义：即使身处低谷，也要满怀希望**

P17 **怀念傅高义**

P19 **中美学者太平洋对话：改变太平洋的潮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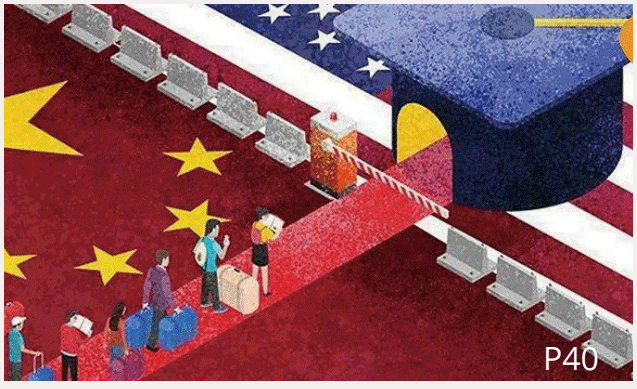
P25 **重建中美关系势在必行**

陶文钊

中美关系曾数度修补，但这一次会加倍困难。然而仍然存在这样做的必要性。中美两国都承受不起动荡，更不用说战争了。

P19

P10


P40

P28　走向“终局”

安刚

中美的未来关系显然取决于两国的选择。好消息是，在特朗普政府制造数年动荡之后，现在有了一个制定新举措的机会窗口。

P32　如何重启中美关系

道格·班多（Doug Bandow）

在等待拜登政府上任这段时间里，北京方面应采取若干步骤，促使两国政府之间建立起更富有成效的关系。

P36　“战略突围”触手可及

赵明昊

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只要拜登执政中美关系就会好转，相反，我们也没有理由放弃缓和紧张并重塑中美关系的机遇。

P40　中美两国必须保持民间联系

裴敏欣（Minxin Pei）

稳定中美关系仍是当选总统拜登2021年议程中的头等大事之一，但要做到这一点双方必须恢复互信与合作。新一届政府应力求恢复文化、教育和人文交流，以修复这些年来两国关系遭受的结构性破坏。

P43　为什么地方利益很重要

李成（Cheng Li）
赵修业（Xiuye Zhao）

在维护中美关系健康发展方面，地方和地方政府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新一届政府可以通过主动接触地方政府和向它们授权来获取积极的成果。

P47　从火星到地球

金培力（Philip Cunningham）

火星之旅需要不同国家和政府之间的国际合作，尤其是中美两国的合作。

修复与重建

张 平

对中美关系而言，过去 12 个月可谓充满惊涛骇浪，一方面受新冠疫情的影响，而充满敌意的特朗普政府施加的一系列制裁措施，又导致双边关系急速下滑。随着拜登入主白宫，修复中美关系将迎来一个机会窗口。

在本期杂志中，我们突出展示了人们谨慎的希望、诚挚的预期，更重要的是来自中美学界专家的建议，这些建议为我们梳理了两国政府和社会可以做些什么，来抵消双边关系遭受的伤害。这些想法和建议为我们照亮了脱离深渊的道路。

我们将本期杂志献给去年 12 月去世的傅高义教授。作为美国研究东亚的领军学者之一，傅高义教授为拉近各国人民间的距离奉献了一生。他的学术研究和著作以及他与不同文化的交流互动都是无价之宝。去年 7 月，中美聚焦网站有幸对傅高义教授进行了视频采访，这是他生前接受的最后采访之一。

何亚非大使开篇为我们带来了有关中美关系新框架的建议，那是一种开诚布公的合作与竞争。赵明昊则告诫我们，没有证据表明拜登上台后中美关系会自然而然地趋向好转。美国学者裴敏欣强烈呼吁取消人文交流限制，认为这种限制从根本上妨碍两国建立互信。

新年带来新希望。还有不到一个月，全球华人将迎来农历牛年，而牛是坚持不懈、勤勤恳恳的象征。我们希望 2021 年能够见证 21 世纪最重要双边关系的缓和。

Hong Kong Forum on
U.S.-China Relations
香 港 中 美 論 壇

U.S.-China Relations: The Way Forward

January 26-28, 2021

China-United States
Exchange Foundation
中美交流基金會

CCIEE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Chin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s

把竞争关进笼子

何亚非
前外交部副部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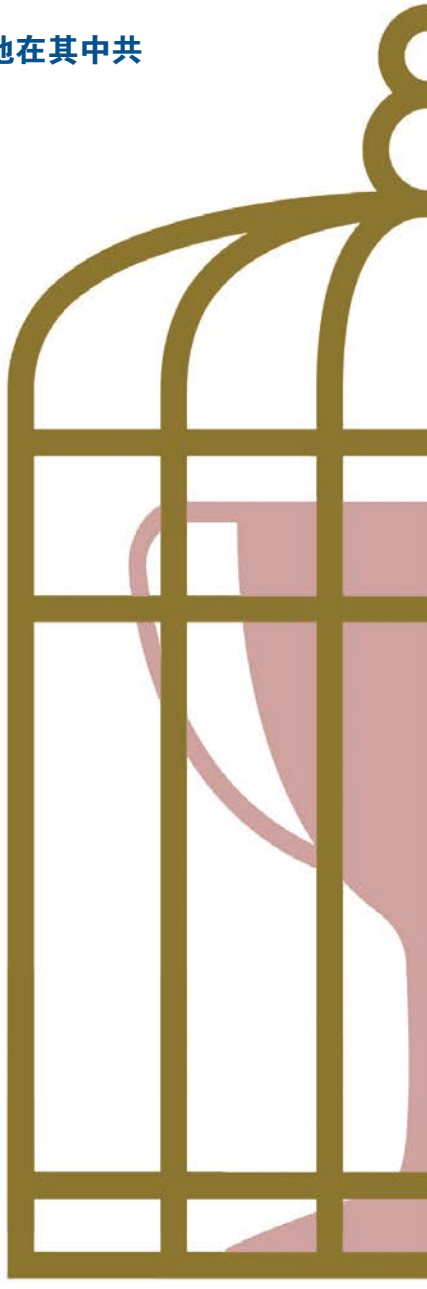
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框架，使中国和美国能够无歧义地在其中共同运作。两国只要愿意抓住这一时机，就可以造福当今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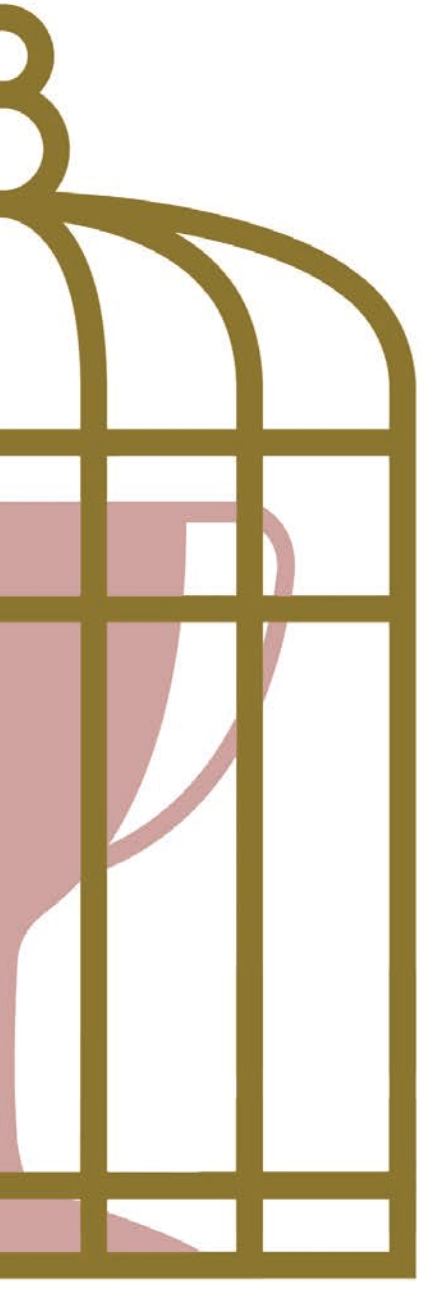
中美战略竞争并非中方所愿，那是美国多年反思两国关系之后得出的战略判断，或者说误判，短期内恐怕难以改变。既然如此，现在的关键是如何把竞争关进笼子，扭转两国关系的“自由落体式”下滑，同时通过对话和建立信任措施争取和扩大必要的合作空间。

拜登上台为中美对话提供了机会，双方需要冷静思考两国关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努力避免新冷战，重新开启合作空间。当然，盲目认为美国新政府上台就会改变一切是没有依据的。

“

现在的关键是如何把竞争关进笼子，扭转两国关系的“自由落体式”下滑，同时通过对话和建立信任措施争取和扩大必要的合作空间。





中美竞争客观存在，理想化世界并不存在。未来是竞争合作还是合作竞争，能否扩大合作空间，实现和平竞争，取决于两国的政策互动。

这次美国大选深刻揭示出，美国国内政治极端化和社会分化已经引发前所未有的资本主义危机，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不平等现象不断恶化，身份政治、民粹主义、“美国优先”继续占据美国政治主流。特朗普 7300 万得票说明，美国社会分裂已经固化，底层百姓与精英的对立、劳动与资本的对立会愈演愈烈，并将继续影响美国的国内外政策，拜登新政府解决国内问题、调整对外政策将面临重重困难，中美关系调整空间也会受到制约。

两国需要从战略和行动两个层面来重新认识、稳妥处理两国关系，以创造两国积极合作、和平竞争的新格局。目前要考虑为竞争建立有框架、底线和规则的“笼子”，防止恶性竞争和失去控制。这是推动两国关系转圜的积极而非消极的做法。

首先，要以底线思维承认和厘清两国竞争关系。中美竞争客观存在，理想化世界并不存在。未来是竞争合作还是合作竞争，能否扩大合作空间，实现和平竞争，取决于两国的政策互动。

两次世界大战浩劫和美苏冷战告诉我们，中美必须和平共存，避免卷入你死我活的零和竞争，尤其不能进行冷战或热战，否则对中美和世界都是灾难。习近平主席给拜登的

> 两国人民对对方的负面情绪严重，加上美国单方限制和新冠疫情因素，双方人员交往和人文交流陷于停滞，连留学生都受到很大影响。

贺电强调，希望中美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这也是“笼子”的底线。

其次，需要正确认识文化差异和意识形态异同，减少敌意，避免陷入意识形态竞争。目前，两国人民对对方的负面情绪严重，加上美国单方限制和新冠疫情因素，双方人员交往和人文交流陷于停滞，连留学生都受到很大影响。民主党要员和重要智库对华表态的意识形态色彩颇浓，令人堪忧。

坎贝尔和苏利文去年在《外交事务》上撰文称，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对美国构成比苏联更大的挑战。对中国文化缺乏了解和犹太教－基督教文化的优越感，使美国两党精英对根植于中国文化的中国政治、社会制度存有偏见，往往从对立的角度看待与美国不同的文化和政治制度。这种“山上灯塔”的思维模式不改变，美国对华认知就会跑偏，误判就会发生。

在这方面，一要停止奢谈“冷战”或者“热战”，为两国关系紧张状态降温。美国意识形态浓厚的冷战式讲话不断，严重恶化了两国关系的生态环境，导致两国人民负面情绪增高。美国新政府要对候任官员和重要智库进行约束和引导，正面客观盘点评论中美关系现状和未来，为两国关系重置创造平衡客观的舆论环境。

二要客观认识两国文化和意识形态差异，避免意识形态置顶两国关系。美国新政府候任官员和民主党资深人士鼓动美国以意识形态划线，联合盟友共同对付中国，譬如建立“技术 12 国集团”（T12），在高新技术领域排挤和打压中国；在印太强化美日印澳四国对话并推动建立针对中国的四国联盟；在贸易谈判中，重点要求中国改变所谓“国家干预”的发展道路。这种把文化差异与意识形态异同划等号，给中国贴上“非民主国家”标签的思维模式，只会将中美关系引入死胡同。

再则，要考虑尽快在共同利益领域有选择地采取并行务实的建立信任措施，弥补严重的“信任赤字”，并展开对话寻求合作的契机和空间。这既是为合作争取机遇和空间，也是为有序、和平竞争创造条件。这是发挥“笼子”的稳定器作用。

中美关系几十年稳步发展的启示是，中美不是一战前的英德，也不是冷战期间的美苏，双方具有根据局势变化寻求利益契合点并开展合作的成功经验。现在契合点与合作空间依然存在。

似可考虑先易后难、有选择地展开对话并采取建立信任措施：

一要尽快恢复人文交流和人民交往，包括支持互派留学生。国之交在于民之亲，如果两国关系的民意基础遭到破坏，且不加以

> 这种“山上灯塔”的思维模式不改变，美国对华认知就会跑偏，误判就会发生。

> 在贸易谈判中，重点要求中国改变所谓“国家干预”的发展道路。这种把文化差异与意识形态异同划等号，给中国贴上“非民主国家”标签的思维模式，只会将中美关系引入死胡同。

及时修复，合作将成为空中楼阁。

二要把共同应对新冠疫情作为紧迫任务，在疫苗研发分配、防治、国际健康码互认等方面紧急展开合作，并积极商讨如何加强世卫组织作用，建立有效疫情应急机制，为未来新的病毒来袭做好准备。

三要尽早恢复贸易谈判，并就两国供应链因受美国对华战略变化和新冠疫情冲击而需要适度调整进行对接。两国经济贸易事关重大，谈判内容和方式要务实可行，真正有利于两国人民。

> 希望美国新政府能与中国携手，助力《巴黎协定》行稳致远。

四要展开金融对话，防范金融风险演变成金融危机。两国在 2008 年金融危机期间同舟共济抗击危机至今历历在目。对话的现实意义是化解巨大的全球金融风险。美元贬值和资本市场大起大落在所难免，防范新金融危机发生、避免世界经济长期谷底运行是共同挑战。中美应再度推动 G20 发挥“全球经济治理首要平台”的领导作用。

五要就网络安全开展对话与谈判。网络安全事关两国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对话具有紧迫性和实际意义。对话内容可考虑制定规则防止网络攻击、确立网络攻击构成战争行为的门槛、探讨建立全球网络治理规则和治理体系、建立危机管控平台就网络安全及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时沟通协商。

六要恢复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为国际社会减少气候变化带来的危害发挥表率作用，并与欧洲和其他国家携手合作，寻求应对挑战的思路和办法。习近平主席在最近的气候雄心峰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团结一心、提振雄心、增强信心”三点倡议，并宣布了中国到 2030 年的减排等目标。希望美国新政府能与中国携手，助力《巴黎协定》行稳致远。

中美两国应该有足够的智慧和意愿充分利用新机遇，只要双方正确认知中美关系的新格局、新发展，脚踏实地为两国和平共存、和平竞争、多面合作创造条件，就必能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

▲ 《华尔街日报》援引拜登高级顾问的话表示“拜登对华政策的核心是他所谓的民主国家峰会，该峰会将寻求建立明显的替代北京专权统治的方案”。

即使身处低谷，也要满怀希望

为纪念美国东亚学界的领军人物、去年 12 月 20 日去世的傅高义教授，我们在此刊登特约编辑周柳建成在去年 7 月 28 日对傅高义教授和北京大学贾庆国教授的采访。为清晰起见，我们对采访略做编辑并压缩了篇幅。

扫描二维码，了解完整的采访。

周柳建成：

本周我太激动了，我要向两位曾经在工作和生活中为塑造世界和人类做出贡献的人致敬——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前主任傅高义教授，以及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原院长贾庆国教授。你们在北京，在波士顿，而我在香港。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又是怎样的呢？外交部长王毅说，中美建交大概40年来，现在两国关系正处在“最低点”。贾庆国教授，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贾庆国：

至少是最低点之一吧，要看你怎么衡量。我认为从政治上讲，两国关系已经到了最低点。但如果你说经济关系、社会联系，我想我们是进步的。所以，我认为是政治关系处在建交以来的最低点。

周柳建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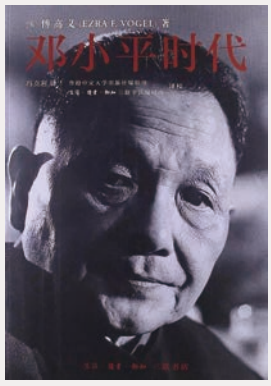
傅高义教授，您见证了这段关系以许多美好而复杂的方式开启、发展、演变。一些人说它到了最低点。大概一年半以前，吉米·卡特警告说，我们正走向一场“现代冷战”。这些只是说说而已，还是如今已经完全成为现实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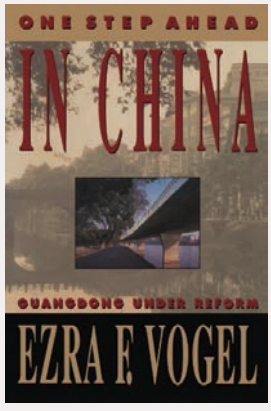
傅高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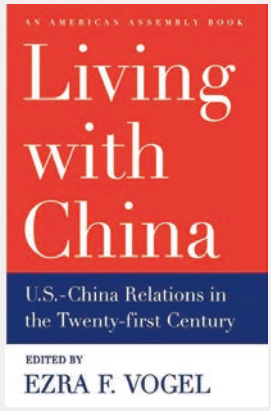
我和贾庆国的看法一样，在政治上，也许我们是处在最低点。正像你知道的，蓬佩奥前几天有一个演讲，我们所有认为中美关系很重要的人，都觉得这个演讲糟透了，对他这个演讲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我认为，从政治上说，有关冠状病毒的讨论，每个国家都指责对方，领导人指责对方国家，说一些夸大的不实之词，这是非常严重、非常危险的。我同意，从政治上说已经是最坏了。但同时，我们仍然有很多联系，甚至是在医疗领域，我们两国的人民在共同努力。当然，我们也有很多商界人士在合作，学者们在一起工作。所以，现在并不像1973年我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时候，当时几乎没有任何接触。

周柳建成：

傅高义教授，您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







最新文章，让我们想起您几十年来教过许许多多中国的学生。您说他们现在左右为难，一方面是对自己国家的忠诚，这是一种真正的忠诚，另一方面是对美国的喜爱，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把美国当成了自己的第二个家。平衡两边的利益，同两边做朋友，在现在的二元世界里是不是做不到？

傅高义：

他们和我的感觉一样，我想爱国，但我也想同其他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美国生活得很愉快。美国人不假思索地批评时，他们批评所有共产党员，好像他们千人一面，好像他们都恨美国，这不是事实。很多在这里的人，他们想爱中国，想帮助自己的国家，但又想与他们的朋友、他们的研究、他们在美国共事的学者和同事保持良好关系，他们左右为难。我认识的很多人都爱国，想帮助国家，当然他们也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与此同时，他们明白，美国还是有很多好人，虽然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充满恶意，特朗普和蓬佩奥说了一些疯话，但他们知道，很多美国人仍然打算做他们的好朋友，打算和他们一起工作。

周柳建成：

那么贾教授，他所说的，以及他在有关美国政策的重头文章中所写的，正推动着对中国友好的人起来反对美国的民族主义……您怎么阻止情况的进一步发展呢？您在自己国家看到了，在成都，就是这一两天，美国领事馆关闭了。几天前我们看到，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团，在经过这么多年之后也关闭了。您对这种停止或暂停有什么看法？如果我们不能前进，没关系，但我们怎样暂停，怎样阻止情况进一步恶化呢？

贾庆国：

眼下很难，我觉得特朗普政府看来下决心要挑起某种危机，以提高他在国内的政治地位，争取连任。所以很难阻止。此外，中国也有国内的政治因素，所以，当美国关闭休斯敦领事馆时，中国觉得它必须关闭成都领事馆。如果美国决定采取其他措施，中国政府也会觉得有必要采取其他措施。因此，我们的关系仍在滑坡，在恶化。我只希望双方能冷静下来，用更加务实的方式来处理两国关系。这很难，但我认为各方人士都应做一些努力。

周柳建成：

傅高义教授怎么看呢？

傅高义：

我想告诉你们这两三天里美国发生的一些新闻，我认为它们使事情有了新的苗头。那就是，在蓬佩奥发表演讲之后，美国国内的反对声非常强烈。很多以前不发声的人现在都发声了。过去三天，除了我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的文章外，还有几篇批评蓬佩奥的著名文章，比过去多了很多。一篇是在昨天《纽约时报》的社论版，整个社论版都在批评蓬佩奥，说我们不能走那么远，我们必须与中国共处，必须找到与他们合作的途径。其次是，在《国家利益》上有篇文章，作者是保罗·希尔，他曾经当过七八年的亚洲地区国家情报官员。他的批评很严厉，而且十分详尽地指出了那篇演讲存在的问题。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刚发表的一篇文章说，我们处理华为的方式是错的。保持所有渠道开放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即使是我们的半导体行业，也需要把产品卖给许多其他国家，这样才能保持现在的超群地位。所以，在过去的三四天里，我在美国感觉到，蓬佩奥的演讲引起了如此强烈的反对，这让我充满希望。当然，特朗普在大选之前恐怕不会有什么改变，他们会说很多话，我担心许多民主党候选人也会说一些不利于促进中美良好关系的话。但是我觉得，现在正形成这样一群人，他们更多地表达自己，开始说出“我们走得太过火了”。这让我觉得更有希望，如果我们在明年1月有一位新总统，我们就可以开始努力把两国关系拉回到更好的状态。

周柳建成：

显然还有一些因素在发挥作用，而且正如傅高义教授观察入微地指出的，在这一切之中仍包含着某些可能。

“

这让我觉得更有希望，如果我们在明年1月有一位新总统，我们就可以开始努力把两国关系拉回到更好的状态。

傅高义：

当然。

周柳建成：

贾教授，您最近和《中参馆》（ChinaFile）进行了一次对话。在这次对话中，您说中国的外交政策与过去是一致的，这是否暗示，或者说认为，在那段时间里，其实是美方在对华关系上的态度出现了重大转变？还是这本身只是一种非常简化的提法？

贾庆国：

我的意思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实质方面没有太大变化。中国仍然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这样才能完成国内改革，实现经济发展。中国仍然坚持反对外国干涉这一主权原则。所以，实际上，中国的外交政策并没有太大的转变。但是在风格和姿态上，它是改变了很多，行事更加积极主动了，这在某种程度上让很多人觉得，中国的外交政策变了。我认为，在实质层面，这种变化并没有那么显著。不过当然，中国的崛起伴随着能力的提升，所以，很多以前被认为不那么重要的事情，现在人们都重视起来。我们的情况不同了嘛。

周柳建成：

傅高义教授，您谈到过富布赖特项目，说通过富布赖特项目派遣到中国的美国人为建立学术关系和重要联系做了了不起的工作，但现在这也受到了威胁。不过，我想谈的是更大范围的教育问题，因为许多学生，许多是你们自己的学生，会担心今年秋天他们去哪里，不仅是中国学生，还有外国学生，全体国际学生。当然了，还有不知几个星期后是不是该背上行李返校的美国学生。我的意思是，您会对他们说什么呢？因为情况仍然很不稳定。我们的谈话是在 7 月 28 日，过去几天的情况也是变化无常。您会对学生们说什么呢？

傅高义：

我要告诉学生们，尽管我们国家采取了非常糟糕的政策，但幸运的是，我们教育者非常团结。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很快就想办法，阻止这种让外国学生更难前来上学的做法。他们得到了美国各大学的大力支持。当然，部分原因是财政方面的。中国学生交很多学费，是很有帮助的。其中很多人对研究实验室来说也非常重要。但在很大程度上说，这是因为我们主张教育国际化。我们以为，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对我们国家是有好处的。他们就各式各样的问题进行自由讨论，我们对此持欢迎态度，认为这对我们的国家有好处，对世界有好处。所以我觉得，我想对来自中国的学生说的是，请他们放心，即使政府内有一些疯狂的人，大学里有一些疯狂的个体，但绝大多数美国人是欢迎他们的，是希望我们的大学对中国学生有吸引力的。

周柳建成：

所以我想请教您，作为中美关系重要支柱之一的教育交流，是不是会成为明日黄花呢？或者是在中美关系当中变成不那么重要的方面。但是贾庆国教授，您不是说，在线交流可能会取代或弥补一些面对面的交流，面对面交流现在受到限制，因为我们不能旅行，我们还在等待疫苗，还在实施遏制疫情暴发的其他公共卫生措施。

贾庆国：

我想，在新冠疫情暴发期间，这是我们继续交流的最有效方式。但在这之后，我们仍然需要送学生出国和接收海外的学生，建立一种

“

我想对来自中国的学生说的是，请他们放心，即使政府内有一些疯狂的人，大学里有一些疯狂的个体，但绝大多数美国人是欢迎他们的，是希望我们的大学对中国学生有吸引力的。

面对面的关系。我认为这种关系非常、非常重要。我自己就是这种交流的产物。我 1981 年去的美国，在那里读完博士，和那里的很多人结下了深厚友谊。我对美国有更好的了解，就是因为我亲身在那里。如果我只是上网课，可能就达不到这种了解水平。所以我觉得，面对面的交流非常、非常重要。我希望美国当前不鼓励外国学生特别是中国学生的政策，在将来能够改变。我相信，继续进行这种交流符合我们这两个伟大国家的最大利益。

周柳建成：

你们都是在对方国家重要的历史节点上来到这个国家的。傅高义教授，您提到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 1973 年，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正好是在理查德·尼克松对北京进行历史性访问的一年之后。1973 年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

傅高义：

很穷，很封闭，人们害怕和美国人交谈，几乎没有汽车，每件事都经过精心的安排。但是我能感觉到，在与我们会面的中国学者当中，存在着启动交流的渴望和期盼。1973 年的时候，有些人，像北大的周培源，他 30 年代在美国呆过。你还有联系，可以感觉到他们渴望开始做一些事情。在美国的我们也有同样的感觉，因为代表团中的一小部分人，他们来自国家科学院，与一些中国学者有过接触，他们非常渴望恢复与对方的联系。这对国际科学很有好处，对友谊很有好处，不幸的是他们做不到这些。他们中的一些人希望，到 1973 年的时候能真正开始开放，但实际上，直到 1978 年三中全会之后，两国关系才真正开始开放，变化才真正开始出现。不过人们可以感觉到，对于很多有机会在另一个国家学习并彼此了解的人来说，这对每个人都是有好处的。

周柳建成：

正如您所说的，1978 年中国才开始改革开放，之后不久，贾教授您就首先前往美国学习。也就是说，您是中国大陆经过十年动乱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中国留美学生？我的意思是，您下飞机后在机场有什么发现？您到的是哪个机场？哪个城市？

贾庆国：

纽约的肯尼迪机场。对，那是一种经历。我到了那儿，不知道自己将面对什么，因为自从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我之前，没有中国学生去过那里，没有中国学生从美国的大学毕业。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是挺担心的。这是一段非常有意思的经历，人们对我很好，而且我觉得这次学习让我大开眼界，我发现人们在好奇心，在很多事情上，都有很多共同的兴趣。所以，这是一次很棒的经历。当然了，当时的物质生活，拿生活水平来说，住的、吃的，几乎所有东西，美国都要好得多。不过从那以后，中国在很多方面已经赶了上来，但是我觉得，作为人类，我们仍然有共同点，这些没有改变。

周柳建成：

我之所以要询问你们二位最早的经历，是因为我知道，对你们来说，它不是学术讨论，

它是一种关系，影响了你们自己、你们的家人、你们的朋友、你们的学生以及他们所有人。所以，这也是一个感性的讨论。如果和傅高义谈 1978 年，贾庆国也有详细的叙述，那么在那个时期，中美之间的技术和科学关系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和吉米·卡特也推动了中国在这些方面的自我提升。而现在，经过几十年之后，几十年也不是太长，我们有了华为，有了抖音，它成为竞争的支柱，几乎像武器一样，是一方或另一方可能挥舞的棍棒。现在发生了什么呢？因为很明显，它在经济实用主义和安全敏感之间创造了一种非常微妙的平衡。现在发生了什么？这里面会有哪些决策过程呢？

2019 年 11 月，傅高义在“亚洲全球对话”上分享了他对美中关系的敏锐分析和深刻见解。（AGD）

傅高义：

我想我们必须承认，在美国国内我们有很多问题没有处理好。我们没有处理好平等问题，一些人非常富有，但也有很多人被取代了，因为他们是产业工人，没有地方工作。我们还没有为他们找到能带给他们信心、收入和自尊的像样工作。当我们有来自外部的竞争时，就非常可怕。对于一些人来说，他们想指责中国干扰并抢走了我们的工作，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觉得，中国人偷走了我们的技术，觉得我们这么努力地发明东西，要花很多时间才提出一个新想法，才开发出一项新技术。有时候，中国人是通过公开的研究报告把这些学到手，这我们不能抱怨，我们得佩服。但是有的时候，一些中国人会偷偷摸摸地这么做，不遵守规则。所以，对于那些对不平等或失业等其他事情感到失望的人们，这些案例成为了焦点。我想，为了在未来 10 年或 20 年里改善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我们也需要努力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需要公平的收入分配，需要实现全民医保，需要建立一个教育体系，为社会底层的人提供与顶层一样的机会。所以，我们自己也有很多功课要做。我们美国人还觉得，中国在尊重知识产权方面有必要更加谨慎，要有适当的感激。我们现在非常担心，中国一些新的电子设备有可能被用来获取隐秘信息，因为我们看到，华为的机器在中国被用来跟踪别人做什么。我们的一些人担心他们的人权和保护问题，担心这些有可能被秘密地利用。所以说，我们美国人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需要与中国人一起解决，以缓和紧张的局势。

周柳建成：

贾教授，您是否认为中国人，或者广义上的整个中国，是不是可以开始治愈创伤，通过更多的分享，来采取措施修复两国关系？

贾庆国：

我觉得，目前的问题是有很多原因的。美国和许多美国人对中国的做法持怀疑态度，部分原因是他们认同不一样的假设。一个是现实主义的假设，当一个大

国崛起时，它会扩张，会挑战现有的大国，也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当然了，还有一些人赞同这样的观点，即美国的政策是要把中国改变成像美国一样的自由民主国家，而他们对于中国没有按照他们的期望做出改变感到非常失望。在特朗普政府眼里，中国是敌人，是对手，这无疑令气氛进一步被毒化。中国是小偷，是罪犯，是一个不遵守法律的国家，是侵略者，诸如此类。所以我认为，现在很多美国人对中国是不信任的。这个问题在 5G 或高科技方面特别突出。基本上，就像汤姆·弗里德曼所说的那样，在 5G 时代，由于互联网，由于信息的高速传播，有关系的国家需要有某种程度的信任。你需要某种信任来维持这段关系。基本上，我认为中美两国正在受信任赤字的困扰。结果就是，特朗普政府能够推动与中国技术脱钩的政策。当然了，中国能做的是努力修复，更好地解释它所做的事情，从南海到新疆，再到香港。我想，中国并没有很好地解释它的行动，为什么要这样做，情况是什么，要邀请人们去看看这些地方究竟发生了什么。中国可以做的另外一件事是，你知道，华为已经提出开放其部分软件的源代码，它试图通过这种方式，确保其他人不会担心自己放在软件里的任何内容。所以从基本上说，在技术方面，我们应该有更多的沟通，也可以互相给对方保证。我想，美国人也有责任向中国保证，微软和谷歌不会损害中国眼里的国家安全。双方必须在这方面做出很多努力，以重建某些信任，重建某种程度的信任，好让两国关系继续保持下去。但在目前，我觉得问题在于，我不相信特朗普政府会这么做。期待下届政府能做到这一点。

周柳建成：

最后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我相信很多人都会问，你们认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不管有没有大选，假如我们去掉这个因素，您认为会发生什么呢，傅高义教授？

傅高义：

我想，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要取决于大选，因为我觉得在特朗普政府的领导下，我们无法指望有太大的改善。人们发表各种疯狂的言论，这不是一个重视外交的、拥有长期战略的组织良好的政府。我认为，在我们这边，最大的希望是到明年 1 月，双方的工作小组开始会面，商讨如何建立双方的信任。美国人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市场对美国公司真的公平吗？我想，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抱怨说，他们的产品如何被使用、被拿走，以及中国政府如何偏袒中国公司，而不是美国公司。当中国还很弱的时候，这没有多大关系，但是现在中国公司很强大，中国人很有竞争力，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了。我们也非常关注像南海这样的地方，在那里，中国的飞机和船只开始有所行动，这让人们对中国的意图有很大的怀疑，让信任变得更加困难。所以简单说就是，明年 1 月，如果我们有一个新的政府，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会晤，假如得到最高领导人的全力支持，我们双方有很多人都能很好地进行这些讨论。我认为，最高领导人必须介入重建信任和改善关系的进程。不过我希望，我们可以从应对新冠疫情和国际变暖这类问题入手，开始建立一些合作项目，然后扩大到安全领域，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开始重新建立一定的信任。我想我们会成为竞争对手，但你要知道，彼此是强大竞争对手的球队也要在一个框架内运作，我想这也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我们需要一个框架来遏制对抗，这样我们才能共同努力，建立真正对双方都有利的友好关系。

怀念傅高义（1930–2020）

周柳建成

在外交事务领域，傅高义或许是一个巨人，但出现在电脑屏幕那一侧的他看起来那么清瘦、虚弱而又温暖。傅高义于 2020 年 12 月 20 日去世，在为他撰写的悼词中，有一点被反复提及，那就是他关于东亚和美国的等身著作中充盈着的深切的人文主义光辉。

我实在不敢造次在这些悼词上画蛇添足。我仅有幸与傅高义教授有过一面之缘，是通过 Zoom。去年 7 月，为制作中美聚焦网站“太平洋对话”的一期节目，我对他进行了采访。但仅通过那一次互动，我就为他的悲天悯人和在这场毁灭性疫情中两国互助合作的必要性深深打动。

除了新冠疫情，他也深知眼下裹挟整个世界的巨大政治分歧。在我们的访谈中，他谈到了美中之间日益恶化的双边关系，以及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在其中扮演的负面角色。傅高义称蓬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发表的演讲极其“糟糕”。

傅高义教授还预测，一个既无外交政策又无长期战略的美国政府，会面临越来越高的反对浪潮。他说：“我认为现在出现了一群更愿意表达的人，他们开始告诉政府我们已经做得太过火了。”

傅高义教授是当代中国故事的见证者，他于 1973 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第一次到访中国。他回忆当时的中国极度贫困，对大部分世界紧锁国门。他说人们“害怕与美国人交流”。但他同时也感觉到，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科学家，都热切渴望与他们远在美国的朋友和同事重启交流，他们是 1979 年美中外交关系正常化后两国之间丰富多元伙伴关系的先驱。

他还谈到了眼下两国关系的摩擦点，如南海问题和知识产权保护，他对于新型技术给人权带来的威胁也表达了担忧之情。但他同时也鼓励公平：“美国人不假思索地批评时，他们批评所有共产党员，好像他们千人一面，好像他们都恨美国，这不是事实。”

当我通过史蒂夫的推特得知其父傅高义去世的消息时，我的心情极为沉重。我翻出了 8 月与他的最后一封电邮，在邮件里他感谢我送口罩的提议，并安慰我说他有充足的储备。更重要的是，我有幸成为最后一批采访他的记者之一。虽然我未曾有幸作为他多年培育出的众多学生之一聆听教诲，但我也深深受益于他穷其一生传授的知识与传递的悲悯。

我在此向傅高义家人、他深爱与爱他的人传递我的悼念之情。

The Pacific Dialogue

The Pacific Dialogue is a new way to virtually connect thought leaders across the Pacific Ocean to continue frank and direct conversations during this difficult time.

改变太平洋的潮汐

朱峰教授
南京大学

“

如果双方都决定主动热情地张开双臂，我想是会得到非常积极的回应的。

“

我们有机会释放出一个改变的信号，一个新方向的信号，而不一定是大规模逆转。

罗伯特·罗斯教授
哈佛大学

在本期“太平洋对话”中，周柳建成（11月30日）采访了南京大学的朱峰教授和哈佛大学的罗伯特·罗斯教授。他向两位嘉宾提出一系列问题，探讨了中美关系的现状，以及这种关系在拜登政府治下的可能情形。

罗伯特·罗斯是波士顿大学政治学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朱峰在南京大学教授国际关系，并任南京大学中国南海协同创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为清晰起见，已对采访内容略作编辑。

扫描二维码，了解完整的采访。

周柳建成：

你们好，我是“太平洋对话”的主持人周柳建成。我现在在香港，很高兴迎来两位嘉宾——南京大学的朱峰教授、哈佛大学的罗伯特·罗斯教授。罗斯先生，就从您这里开始吧。下任美国总统将于1月20日宣誓就职，剩下几周的时间，感觉还挺长的。在这期间，您对唐纳德·特朗普有什么预估吗？您认为他在这段时间里会做什么？

罗伯特·罗斯：

预估？我们永远不知道能从唐纳德·特朗普身上预估到什么。而这正是令人担忧的地方，有多种可能性都让我们感到紧张。例如，就在过去几个月里，他通过对台军售和美方人员访台，打破了各种禁忌。我们还对与解放军有关的中国公司实施了新的制裁。

所以，首先是，特朗普政府看上去是想通过一系列行动来束缚拜登政府的手脚。其次，这也许反映了总统本人对中国大陆的敌意。第三，国务卿蓬佩奥似乎正在进行一场十字军东征，可以说是一场反华的十字军东征。我们知道，支持台湾与其说是支持台湾的民主，不如说是看我们能做点什么来给大陆制造麻烦。因此，不管是他的越南之行，还是对台政策，还是意识形态演讲，在1月20日之前特朗普总统和国务卿蓬佩奥这两个人都让我们感到紧张。没错，他能够做一些事情，但我们永远不知道会是什么。

朱峰：

我认为，特朗普政府和对华鹰派人士、蓬佩奥以及他的白宫同僚正让我们的关系面临彻底毁掉的危险。所以它的影响很可怕。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即使当选总统拜登可能（让美国）回到正轨，而不是像特朗普那么疯狂，但如今的问题是，更严厉地打击中国和反击中国已经成了广泛的共识。

所以，我不认为拜登领导的美国政府会

“

问题是我们不知道特朗普在打击中国从而让我们的关系崩溃这件事上会走多远。

完全用一种“去特朗普”的方式处理与北京的关系。正如你提到的，当选总统拜登还有几个星期就要就职了，问题是我们不知道特朗普在打击中国从而让我们的关系崩溃这件事上会走多远。

周柳建成：

拜登－哈里斯过渡团队已经开始宣布人选名单，这些人将在未来四年内塑造美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罗斯先生，这些人当中有谁让你印象特别深刻吗？通过他们，白宫会确立什么样的基调和节奏？

罗伯特·罗斯：

我认为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谈判者团队，一个解决问题的团队，不是了不起的全球战略家，不是地缘政治家，也不是“冷战斗士”。他们环顾世界，想知道：“问题有哪些？我们可以和谁谈判？”让我们来看一看，能不能解决其中一些影响到美国利益和国家安全的问题。

因此，在他们着手处理美中关系时，总统和他提名或挑选的国务卿布林肯会明确地表示，他们将与中国竞争。我想，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两个大国，正在崛起的大国和守成大国，在东亚安全方面是有利益冲突的，我们会展开竞争。我们也会有经济上的摩擦。特朗普总统上任后，采取了一种全政府方式来遏制中国。为此，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所有专家都被撤走了，所有的业务性专家，对话结束了。在国务院，职位从来也没有填补上，对话结束了。而即将上台的政府将恢复对话和专家工作，恢复功能性和合作，恢复在不同领域采取不同对策的美中关系。

周柳建成：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团队。朱峰先生，在您眼里，像约翰·克里这样的人物，他是新的气候变化特使，当然也很熟悉中国和世界，还有那些外交政策专家，包括安东尼·布林肯，人们称他是下一任国务卿。这些人或这样一个团队，这个阵容是中国可以有效合作的吗？

朱峰：

是的，我基本上同意。乔·拜登挑选的外交政策团队，在国际事务和对华政策方面看来非常专业和有经验。因此我认为，这种专业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团队对中美关系来说是一个重大改变。我们看特朗普政府当中的很多大人物，比如迈克尔·蓬佩奥和彼得·纳瓦罗，他们是非常情绪化的对华鹰派，他们回到了“敲打中国，反击”上。就像鲍勃也提到的，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竞争，我们都必须合作，因为今天在考虑世界事务时，我们双方彼此都是不可或缺的。

出于经济原因，美国和中国是老大和老二。我们也有义务确保世界和平、经济稳定与繁荣。我很能理解美国战略界对中国崛起的焦虑，但我们也应当注意到，美中关系是有故事的。

我的看法是，拜登政府不会简单把美国的对华政策带回奥巴马时代。这些专业且经

“

我们需要把美国的领导地位和多边机构区分开来。

验丰富的外交官和安全专家懂得如何在竞争与合作之间寻找微妙的平衡。对此我非常期待。

周柳建成：

我要问一下你们二位对这件事的反应：存在沮丧，无声的沮丧，虽然拜登－哈里斯过渡团队充满魅力，会以务实的态度处理他们将要面临的工作，但还是存在这样一种言论，即使在特朗普时代我们也常听到，那就是：“我们要恢复美国对世界的领导。我们将再次领导世界。”回归美国例外论是一个错误吗？政界的评论人士一直在警告这种美国例外论，它首先会让美国人陷入麻烦。

罗伯特·罗斯：

我认为，我们需要把美国的领导地位和多边机构区分开来。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正是拜登团队在谈论的，它是对美国孤立主义、反多边主义和抹杀道德的回应。在多边机构中，美国可以发挥领导作用。但没有中国，没有中国的合作，它就无法发挥领导作用。没有美中共识，这些机构就无法成功。

另一方面，领导力是可以分享的。美国可以在北约发挥领导作用，可以与我们在世界各地的盟友一起发挥领导作用，可以在经济上发挥领导作用，尤其是在同中国谈判时。这与在东亚安全问题上说“美国可以成为世界第一”是非常不同的。

周柳建成：

但是罗伯特，这会从根本上让事情发生改变吗？比如，我们知道您现在是待在家中在线授课，当您想到自己的学生，那些国际学生，您觉得情况会为了他们而有所改变吗？因为，举例来说，学生层面或外交层面的交流，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是我们所知道的那样了。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几十年来，正是这些交流真正推动了双边关系的发展。这种情况会以某种方式得到扭转吗？会修正并改进吗？

罗伯特·罗斯：

我想，你在这里要说的是，各国还会把美国当成领导者吗？学生和文人还愿意来美国的大学吗？恢复美国在世界上的声誉是需要时间的。

它需要时间，原因有很多。第一，人们将继续审慎地注视美国。拜登能重新欢迎世界各国的人们来美国吗？他能着手捍卫被世界多国认同、但在国际上和美国政治生活中被特朗普否定的价值观吗？要让人们感到放心还需要一些时间。

第二，之所以需要时间，是因为拜登的议程十分庞大。他要处理经济问题，要处理新冠疫情，要处理移民问题，要处理医疗问题。我想，你们是想要中国学生的移民和签证问题得到处理，向中国人开放美国的大学。

但在很多问题上，我认为我们应当寻求的不是政策逆转，而是放缓，或者什么都不做。美国在两年内不对台湾采取任何行动，这会让许多人乐于接受。如果我们只是停止发表蓬佩奥那种意识形态上反华的言论，那是会被接受的。我们是不是只简单地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种字眼，而不是“中共”，那对我来说其实就是个代号。所以，我们有机会释放一个改变的信号，一个新走向信号，而不非得是大规模的逆转。

周柳建成：

罗斯先生，您的《习近平时代的中国》一

“

与之前唐纳德·特朗普执政时不同，今天我们有机会对中美关系进行划分，在必须竞争的地方竞争，在可以合作的地方合作。这本身对人类更有利，对世界更有利，对美中关系更有利。

书将中国领导人描述为几十年来最强大、最果断的领导人。我们看吉米·卡特和邓小平就知道，领导人一起找到正确的动力是多么重要。你们二位在关注乔·拜登和习近平的时候，他们彼此已经很熟了，你们认为，那种动力能让我们回到当初那个时代吗？当时中美关系当中发生的伟大事件不仅影响两国，而且影响了人类。

罗伯特·罗斯：

对于美中两国在全球秩序中能否成为各方面的好朋友，对于习近平和乔·拜登之间的私人关系能否从根本上影响两国关系的走向，我是表示怀疑的。当然，习近平是一个政治上高明的策划者，总是着眼于中国的利益和他的政治利益。我认为，不能指望一种私交会改变他的目标甚至他的政策。

话虽如此，但这是一个想要有所成就的美国团队，一个想得到结果的团队，想与中国达成协议。所以这个团队是有机会的。我相信他们会合作得很好。他们是战略专家，也是理性的。就像朱峰说的。这些理性的人会以理性的方式处理国家利益，他们会看重对美国有帮助的成本效益分析。他们认识到与中国合作势在必行。至于我们能否达成共识……就像我们说的，“一个巴掌拍不响”。美国想在朝鲜问题上有所作为，中国会合作吗？我们想在伊朗问题上有所作为，我们会有足够的共同利益来达成协议吗？这些问题仍然是悬而未决的。我只想说，与之前唐纳德·特朗普执政时不同，今天我们有机会对中美关系进行划分，在必须竞争的地方竞争，在可以合作的地方合作。这本身对人类更有利，对世界更有利，对美中关系更有利。

朱峰：

正如你们二位提到的，当选总统拜登和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当年相处得很好。现在的问题是，是什么改变了？变化极大的是我们的双边关系，甚至是非常基本的政策框架。没人能忽视如此之大的变化。正如鲍勃刚才明确提到的，即使在拜登领导下，也没有人对中美关系的回暖抱太多期望。

我认为问题在于，现实地说，至少有两件事是我们可以期待的。如果双方都决定主动热情地张开双臂，我想是会得到非常积极的回应的。我认为，人们对两国关系的风险意识和危机感在不断增强，所以主动接触非常重要，我的意思是谁将迈出第一步，伸出手来说：“嗨，让我们一起坐下来吧。”然后第二点也很重要，那就是我们希望实现什么样的政策预期？

周柳建成：

南京大学的朱峰教授，哈佛大学的罗伯特·罗斯，非常感谢你们。

“

如果双方都决定主动热情地张开双臂，我想是会得到非常积极的回应的。

重建中美关系势在必行

陶文钊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中美关系曾数度修补，但这一次会加倍困难。然而仍然存在这样做的必要性。中美两国都承受不起动荡，更不用说战争了。

在过去 70 年中，中美关系有过两次重建。第一次是从 1971 年基辛格访华、1972 年尼克松的“破冰之旅”到 1979 年中美建交。这次重建根本改变了中美关系的性质，使之从敌对关系变为正常国家关系。

第二次重建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由于先前两国和解的战略基础消失，美国许多人怀疑中国和中美关系对美国的价值，甚至有人认为中国将步苏联的后尘，因此在冷战结束后的头几年中，中美关系颠簸不断。中方以坚持改革开放包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重建两国关系。经过几年实践，美方认识到在后冷战时期两国仍然是互有需要的，因此逐渐转变观念，改变政策，与中方相向而行。

1995 年 10 月江泽民主席赴纽约参加联合国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活动期间，与克林顿总统进行了小范围的深入对话，达成诸多共识。然后又通过两国各层次的对话和沟通，终于实现了 1997 年 10 月江泽民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和 1998 年 6-7 月克林顿总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成功重建了两国关系。重建的关键是确认两国在后冷战时期的共同利益。在江泽民抵美前几天，克林顿发表长篇讲话，他系统阐述的两国在六个方面的共同利益代表了美国两党的主流认识，也是中美两国的共识。由于此次重建，中美得以抵御“炸馆”、“撞机”等突发事件的冲击，并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达成协议，美国有了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立法，中国顺利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经济真正起飞。这次重建以来，中美关系得到了 20 多年比较健康稳定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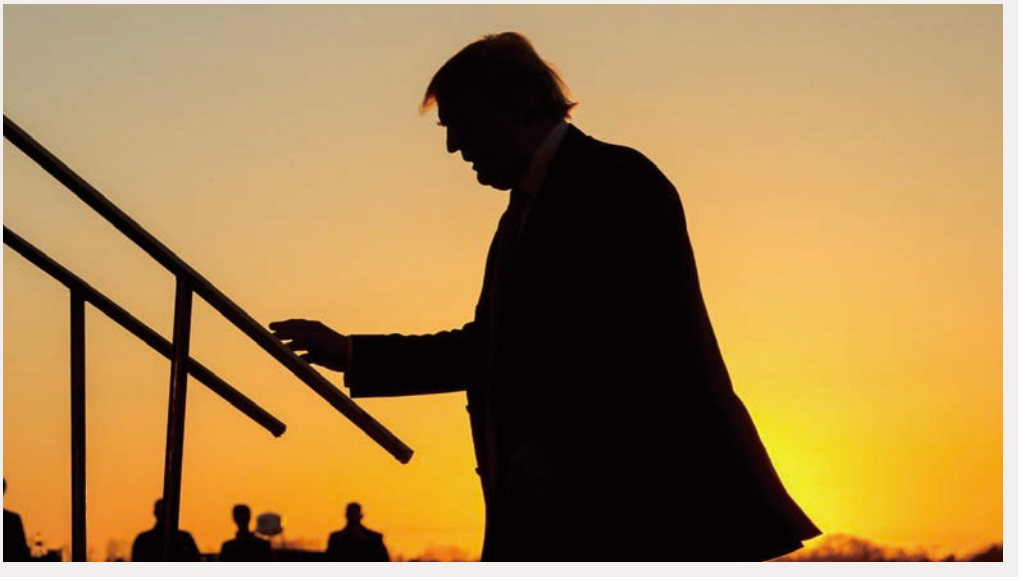
为什么现在要提出再次重建中美关系呢？笔者以为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特朗普政府实质性地

改变了对华政策，对中美关系造成了严重破坏。对于中国的核心利益——安全、主权和发展利益——特朗普政府无不加以挑战，它挑战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丑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它不断冲撞“一个中国”的政策底线，扶植、怂恿“台独”势力，支持新疆、香港的分裂势力，并在南海频频制造事端；它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产业，竭力要把中国经济限制在全球产业链中低端；它竭力阻碍中美之间的人文交流，罗织罪名，试图把联系两国的纽带最后切断。现在，除了经贸往来，中美关系确实已经所剩无几，两国关系非重建不可了。

> “
>
> **除了经贸往来，中美关系确实已经所剩无几，两国关系非重建不可了。**

> “
>
> **竞争要有规则，要有章可循。**

其次，从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国国内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国际形势出现了种种新情况，其中之一是两国实力对比的变化。十年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今年的 GDP 可能相当于美国的 70% 左右，中国又是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第一外汇储备大国，这些与 90 年代两国经济、军事、科技实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不同了。这当然应该成为建构两国关系的考虑因素。如果没有特朗普政府对两国关系的毁灭性破坏，双方本可以通过适当的调整、相互顺应来体现实际情况的变化，2013 年中方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这样一种尝试。美方也部分接受了中方的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亚太再平衡”战略。



“

现在中美之间要就管控双方的分歧进行全面、深入、持久的对话，这是重建两国关系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

但现在，经过特朗普这个任期的胡作非为，调整的基础已经被破坏了。

第三，毋庸讳言，现在中美关系中的竞争面扩大了，双方从经济、军事到科技，从台湾到南海，从地区秩序到全球治理都有竞争。但竞争要有规则，要有章可循，比如美苏在冷战时期的竞争。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时，美苏领导人都触摸了核按钮，也都隐约看到核大战的深渊，危机给双方的一个共同教训是，不能无规则地竞争。此后，双方仍然在进行军备竞赛，但关于军备控制的谈判也被认认真真地提上了日程，美苏达成了一系列条约，并有查验核实的措施，这是冷战期间美苏热战终于得以避免的一个重要原因。可惜这些条约近年来被美方废除了不少。中美之间也不是完全没有管控的规则，在奥巴马政府时期达成的“关于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等就是这样的规则。但在许多方面还缺乏规则，而这些年特朗普政府又不按规则出牌，翻云覆雨，出尔反尔，使两国关系真正处于危险境地。现在中美之间要就管控双方的分歧进行全面、深入、持久的对话，这是重建两国关系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

重建中美关系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而且此次重建比前两次更加繁复，因为中美关系本身的内容变得丰富了，范围变得广阔了。但重建是势在必行的，因为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过去 40 年在不同美国总统任内中美双方会给两国关系一个不同的定位和说法，但大体上是建设性的合作关系，两国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合作大于竞争。而今后的两国关系是竞争与合作并存，很可能竞争大于合作，因为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已经认定中国是对美国全球地位的主要挑战，是美国的主要战略对手。在重建过程中，中美双方的政策都会进行相应的调整。说到底，中美是要和平共存的，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这个道理最终仍会被证明是正确的。

“

而今后的两国关系是竞争与合作并存，很可能竞争大于合作，因为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已经认定中国是对美国全球地位的主要挑战，是美国的主要战略对手。

走向“终局”

安刚（An Gang）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世界知识》杂志编辑

中美的未来关系显然取决于两国的选择。好消息是，在特朗普政府制造数年动荡之后，现在有了一个制定新举措的机会窗口。

“
中美在处理彼此关系时对自己和对对方都有一套战略假设，彼此战略假设的错位是导致战略误判可能发生的根源性问题。

在即将过去的2020年，围绕中美关系现状和前景问题，笔者所在的研究机构同一些美国智库保持着对话。在这些对话中有三个关键词频闪，给人以启发。

第一个关键词是“战略假设”（strategic assumption）。

中美在处理彼此关系时对自己和对对方都有一套战略假设，彼此战略假设的错位是导致战略误判可能发生的根源性问题。尽管双边关系还在持续恶化，来自两国高层和战略界关于中美必须坚持对话的呼声从未止息。

拜登团队已全面开启接权过渡程序，值此特殊阶段，中方接连发出“重建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战略框架”的信号，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强调“沟通对话是正确理解彼此战略意图和内外政策的有效途径，中方愿意同美方开启各层级、各领域平等对话，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交流”。可能是由于过渡政治的高度敏感性，拜登团队尚未做出公开、直接回应，但其早先宣称的“以关系驱动外交”原则已摆明先了解对方真实意图再确定实施何种政策的路径。

对话精神是中美关系合理框架的最后支柱。隔空喊话不是对话，只有坐下来面对面进行推心置腹的交流才是对话。中美不能凭空捏造“战略假设”，必须坚持加强对对方和对自己的了解，找到最贴近事实的“战略假设”，为运筹中美关系找准出发点。当然，仅重新激活对话框架是不够的，必须以均衡反映双方正常、合理关切的方式赋予对话以实质内容，也有必要以无损双方尊严的方式建立对话成果的执行机制。

第二个关键词是“终局”（endgame）。

中美关系是流动性的，在不断发展演变中，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特征。过去四年，特朗普政府代表美国单方面做出了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选择，这背后有着明确的跨党派共识。这种共识意识到，中国崛起已经是美国面临的最主要战略挑战，美国必须正视现实，调转战略方向，以更有效的办法加以应对。但特朗普政府奉行全方位、不定向的贸易强硬政策和损

“
对话精神是中美关系合理框架的最后支柱。

> 其意不仅在于把美国的对华政策锁定在系统脱钩、强硬对抗的趋势里，也在于限制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调整的空间。

毁美国全球同盟体系基础的单边主义政策，其对华政策被民主党和共和党建制派、专业派认为是“贸易功利主义”、低成效和没有章法，也未能调集同盟体系的真心配合。特朗普政府在执政最后日子里不断“加杠杆”密集针对中国的措施，逼迫中国跟牌，加紧固化中美之争是意识形态之争的“叙事”，加紧完成厌华、反华、遏华的社会总动员，其意不仅在于把美国的对华政策锁定在系统脱钩、强硬对抗的趋势里，也在于限制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调整的空间。

拜登当选时，众多中国观察者认为其优先处理国内事务和多边主义的政策倾向有可能为中美关系的缓和与改善提供一个“机会窗口”，一些人在评论时使用了“重置”一词。但美国的学者们在近期对话中屡次表示，“重置”用词不当，拜登政府仍会在处理涉华具体问题时秉持战略竞争的思维。似乎可以预见，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将是基于试图恢复美国国力努力的多边主义的遏华政策。

2021 年入主白宫的总统拜登已不是 2011 年高调访华的那个副总统拜登，2021 年的美国国家利益同 2011 年相比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都处在快速行进的变局列车上，如果美国的对华战略继续围绕“竞争”展开，中国是否应该跟，如何跟，又该如何界定新时期的对美战略和中美关系？这是一道令人困扰却又无法绕开的命题。

未来是开着口子的。我们不是被动接受中美关系演变的每种可能结果的，必须有自己的选择，而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走向什么样的“终局”，既由中美两国各自的政策决定，亦由双方的互动决定，第三方的利益和态度也可以产生影响。

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必须对自身、对方和中美关系所处的历史阶段有清醒的认知，安排相应的政策，但也要对未来大趋势有所判断，不能“困在当下”。在笔者看来，中美关系的可能前景存在一道由暗到明的“光谱”。“暗”的一端是，两国关系在相互敌意假设的驱动下逐渐失去控制，局部领域矛盾不断激化，最终蔓延成全域危机，引发全面对抗和恶性竞争，战争和激烈冲突风险无法排除。“明”的一端是，双方在合理竞争、适度合作、严格管控、有限碰撞的轨道中找到新的战略平衡，最终良性竞争、积极合作、比肩进步，彼此博弈走向“正和”。目前的中美关系仍处在从接触合作到战略竞争的转折过渡期内，终局远未到来，然而也在一点一点地向“暗”端靠近。这是一种危险的趋势，双方必须行动起来加以遏制。对中国而言，阻止危险趋势既要靠积极对话与合作，也

“

运筹未来中美关系也要考虑一旦在某个领域、某一问题上发生危机，如何控制其规模和烈度，避免其扩散至其他领域。最好还是哪个领域出问题用哪个领域的办法去处理，这也是“工具箱”意识的要义所在。

要靠坚决斗争与博弈，两手不能偏废。

第三个关键词是“工具箱”（toolbox）。

我们在选择未来的同时，也要开启准备未来的进程，在恢复理性对话和重启互利合作乃至开辟新的合作空间方面采取行动，同时做好解决双方具体关切和棘手问题的准备。所有这些，都要求拥有充足的政策准备和积极应对、主动作为的工具储备。

有鉴于如今中美矛盾的全域性特点，以及两国国内政治氛围和民间情绪的变化，具体分歧已很难就事论事地处理，“牵一发动全身”的敏感点越来越多。因此，运筹未来中美关系也要考虑一旦在某个领域、某一问题上发生危机，如何控制其规模和烈度，避免其扩散至其他领域。最好还是哪个领域出问题用哪个领域的办法去处理，这也是“工具箱”意识的要义所在。

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有塑造未来的意愿和能力，中国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力是在上升的。就像王缉思教授在一篇文章里指出的，中国在历史上几次发挥过通过改变自己来改变中美关系基本轨迹的塑造作用。然而这一次，中国不可能只通过改变自己来改变中美关系。

如果两国受自身能力和外部环境所限，无法创造合作伙伴的美好前景，也不愿选择恶性冲突的极坏前景，又做不到彻底切断千丝万缕的联系、摒弃广布的功能性合作，那么就有必要重拾相互尊重的精神，积极设置行为的边界和底线，进而确立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范式，争取走向正和终局。

“

有必要重拾相互尊重的精神，积极设置行为的边界和底线，进而确立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范式，争取走向正和终局。

如何重启中美关系

道格·班多（Doug Bandow）
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在等待拜登政府上任这段时间里，北京方面应采取若干步骤，促使两国政府之间建立起更富有成效的关系。

美国总统竞选幸运地结束了，乔·拜登将于 1 月 20 日入主白宫。此次政府换届为重置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系创造了机会。

中美双方应当努力摆脱暴力冲突和敌视对抗，走上谨慎竞争和关键合作之路。民意调查显示，中国在西方的声誉已经下

“

制定本届政府的对华政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降。尽管难以测算，但中国民众对美国及其最亲密盟友的感情可能也变差了。

毫无疑问，两国政府间的热情已经消退。然而，这两个国家对对方抱以无限的敌意，还是有节制的反感，这中间有极大的区别。后者令和平及富有成效的关系具有可能性，哪怕有时伴随着不安和困难。

虽然中国将是新政府面对的最重要国际问题，但总统最初的注意力可能会转向国内危机，包括疫情、经济复苏和国内的冲突。

至于国际事务方面，伊朗大概是最迫在眉睫的挑战。随着相对温和的哈桑·鲁哈尼将于 8 月卸任，华盛顿几乎没有时间如拜登承诺的那样，去修复核协议。另外的重要议题是恢复与俄罗斯的军控协议，以及终止受美国支持的也门大屠杀。

此外，像中美两国政府关系这类重要且复杂的事务，需要认真检视，并由那些被挑选在行政部门任要职的人来做决策。国务院局级任命、新任国防部长、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亚洲事务的人选、重要经贸职位的人选，这些都会影响对华政策。制定本届政府的对华政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拜登政府考虑政策、选择相关官员和处理其他危机的时候，中方应该为帮助建立更有成效的关系打下基础。有争议的民族主义诉求可以舒缓个人的挫折感，发泄公众的愤怒，但也会削弱国际关系，这一点并不奇怪。为了改善有可能严重出错的重要双边关系，最好是把双方眼中认定的轻视和过错放在一边。

在等待与拜登政府全面接触的同时，北京可以做些什么呢？

1）高层官员应当谈及一种新的关系，它承认存在难以避免的重大分歧，但要约束对抗行为，即使不是出于礼貌而是出于必要，也应寻求合作的领域。北京还应该注意，当另一个国家的关键利益遇到危险时，双方均有意妥协是很重要的。同时它应当表明自己愿对新政府的提议做出回应。

2）中国应该利用其对朝鲜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劝说金正恩放弃朝鲜当局一贯的挑衅行为。在东北亚制造新的危机，可能导致涉及中美关系的严肃会谈被推迟，对华鹰派人士会把朝鲜的不良行为归咎于北京。此类举动将促使美国加大用来对付平壤的军事投入，这将与在亚太其他地区扩充军力以对抗中国的建议不谋而合。

“

有争议的民族主义诉求可以舒缓个人的挫折感，发泄公众的愤怒，但也会削弱国际关系，这一点并不奇怪。

“

北京已经为“一带一路”的不良项目和债务付出代价。

3）习近平应当建立包容性经济理念。与共和党人相比，民主党人对美中贸易的争议更大。主动表示愿就解决知识产权、商业间谍活动、强制技术转让及其他争议问题达成妥协，会显示他对改善两国关系是认真的。这样做不是要北京实质性投降，而是认真解决美国的核心关切。

4）中国最好尽量减少对美国友好国家的“战狼”外交和经济挑衅。华盛顿特别注意到了针对澳大利亚的协同攻击，这导致一些政策制定者敦促美国加强对受中国威胁的盟友的支持。美国的这些伙伴国也更有可能施压华盛顿出台更严厉的政策。况且，北京的行为还强化了对华鹰派的论点，即中国对亚洲和其他地区构成严重威胁。

5）无疑，美国及其盟友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攻击看上去颇为自私。西方主导的金融机构花了几十年时间，把钱投入到第三世界国家，而这些钱被大肆窃取和浪费，给贫穷的人民留下了不可持续的巨额债务。不过，北京已经为“一带一路”的不良项目和债务付出代价。中国应就发展融资的各种方式提出讨论建议，也许是在 G20 内部提出。能否通过东西方的合作，来帮助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呢？

6）新冠肺炎依然是一场全球危机，其起源仍是一大问题。北京可以表示说，它愿意参与有关疫情何以发展至此的大范围调查，以帮助解决该问题的政治影响，因为调查也将包括各国如何应对疾病的传播。此外，调查应由与当前中美争端无利害关系的个人和组织承担。从诚实、公开的调查中我们可以获知很多东西，而中方的合作意愿将有助于即将上台的拜登政府化解日积月累的敌意。

7）东亚 – 太平洋海域的领土争端日益成为热点问题。可以理解，这个问题对北京比对远在几千英里以外的美国更重要。然而，对华盛顿维护航行自由和致力于和平解决地区争端，中国应当表示尊重。中国还应当注意到，其他国家也有必要表达它们参与其中和进行谈判的意愿。为此，北京可以表示，它对有创造性的合作开发建议持开放态度，也就是在维持和平关系的同时推迟做出棘手的主权决定。

当然还不止这些，在签证和媒体限制方面，减少针锋相对的循环报复也是必须的。但如果不解决更根本的问题，中美关系是不会有明显改善的。中国可以帮助创造一个更加有利的环境，就多个双方感兴趣的问题启动广泛的讨论。

目前，美国与中国之间几乎不存在信任和融洽，这种状况不大可能有所改变，然而两国政府必须找到前进的道路。习近平政府应当利用美国的政治过渡期，释放有兴趣通过合作来解决两国间最棘手问题的信号，为这一进程提供助力。

“

但如果不解决更根本的问题，中美关系是不会有明显改善的。

吉祥
2021
HAPPY NEW YEAR

“战略突围”触手可及

赵明昊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只要拜登执政中美关系就会好转，相反，我们也没有理由放弃缓和紧张并重塑中美关系的机遇。

外界普遍期望，拜登执政会使中美紧张关系得到缓解，进而避免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陷入更严重的冲突。拜登及其核心外交政策顾问认为，中国不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而是最重要的长期挑战，美国不应与中国打新冷战。虽然拜登政府仍会继续在大国竞争视角下处理中美关系，但其立足点在于“让美国跑得更快”，与中国展开正和竞争。

无疑，与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采取极限施压等对抗性做法相比，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基调或许稍显和缓。但我们不应想当然地认为，中美关系的“红色警报”会随着拜登执政而自动解除。不切实际的期望往往会导致未来几年中美关系变得更加紧张和糟糕。应当看到，拜登政府在调整中美关系方面仍面临极为艰困的挑战。

首先，拜登需要处理“奥巴马遗产”和“特朗普遗产”的问题，既避免给外界留下对华软弱的印象，同时又有选择地继承特朗普政府处理对华关系的理念和手段。特朗普的任期即将结束，白宫正不遗余力地在对华政策方面打造“特朗普遗产”。近期，在国务卿蓬佩奥的主

> 我们不应想当然地认为，中美关系的“红色警报”会随着拜登执政而自动解除。

导下，美国国务院发布《中国挑战的方方面面》报告，力图进一步塑造所谓的“中国挑战”，为下届政府处理对华关系进行框限。拜登如想取消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施压的任何一项举措，都可能被批评为对华软弱。

其次，拜登需要面对来自民主党党内的压力。以候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为代表的新一代民主党政治人士在对华态度上非常强硬。尤其是，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与共和党人并无二致，甚至会更加“意识形态化”。此外，民主党内的“进步派”力量，如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和伊丽莎白•沃伦，也对中国缺乏好感，他们宣扬中国的“不公平贸易”做法伤害了美国工人和中产阶级。“进步主义的外交政策”还关注国际经济政策的地缘政治影响，非常警惕中国等国将经济力量“武器化”。

第三，拜登上台后将把应对新冠疫情和处理与之相关的经济挑战作为优先事项，在处理对华关系上的精力和政治资本都将是有限的。共和党很可能继续控制参议院，民主党在众议院的政治优势也会减少，拜登主导的白宫将面临来自国会的巨大压力。应当看到，美国国会的两党议员在对华采取强硬政策方面有着较深的共识，这一点从《2021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的涉华内容不难看出。众议院的“中国工作组”在 2020 年 10 月发布报告，围绕如何加大压制中国提出了 400 多项具体建议。虽然“中国工作组”成员都是共和党议员，但这些建议吸纳了民主党人士的想法。

显然，过去几年特朗普政府已经将中美关系带入巨大困局，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警告的，双方之间发生战争的风险不容低估。拜登政府如何制定和实施其对华政策，不仅关乎未来四年中美关系的走向，也将对 2035 年前两国能否实现“竞争性共存”产生重大影响。未来几年中美两国领导人面临的共同挑战在于，一方面他们必须妥善处理中美关系的短期风险和冲突，另一方面他们需要为管控未来数十年的中美战略竞争设立框架和规则。

鉴于这一艰巨挑战，同时考虑到拜登执政的实际困难，必须为中美关系的重启制定切合实际的目标和路线图，并为此投入必要的时间、精力和政治资本。

第一，应对中美关系进行修复，纠正特朗普政府在中美关系上采取的极端做法。中美人文交流的瘫痪对两国关系的伤害是根本性的，文化脱钩的做法只会加大中美关系裂痕。双方可以同步采取一些修复性措施，为中美的协商谈判营造良好氛围。比如重新恢复两国在对方国家的总领事馆，减少在人员签证上的限制，停止对媒体记者的打压。

第二，重建中美对话机制，不断强化双方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和效率。中美除了应当延续经贸谈判，还需恢复特朗普执政时接近中断的外交对话渠道。美方希望推进“以结果为导向”的对话，但这也要求美方能够做出必要妥协，而不是只给中方“开单子”。在数字经济、技术治理等方面如何提高对话质量和专业化水平，是中美政府官员面临的共同挑战。

第三，结合两国各自的国内政治和发展议程，以务实方式推动中美合作。中方已在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采取积极举

▲ 2021 年 1 月 6 日，受总统特朗普所发推文的煽动，美国国会大厦发生骚乱，大厦一度被特朗普的支持者暴力闯入和占领。

措，并表示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在应对疫情挑战、落实《巴黎协定》、发展清洁能源经济、维护全球金融稳定、防扩散等方面，中美应当制定具体的合作方案。此外，双方还可考虑在基础设施建设、数据使用与保护以及反洗钱、反逃税、反恐怖融资等领域开展合作。

第四，切实加强危机管控，避免中美在台海、南海等地区发生直接军事冲突。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之间的相关交流应得到增强，中美双方需建立多层级的危机沟通渠道，完善危机应对的相关程序，强化一线军事人员的危机管控意识和能力。在奥巴马执政时期，中美之间曾建立亚太事务磋商机制。相关机制应当被恢复，以减少中美对彼此的误判，避免两国因第三方因素陷入冲突。

总之，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拜登执政会使中美关系自动好转，但也没有任何理由放弃拜登执政给中美缓和紧张关系带来的机遇窗口。为实现中美关系的“战略突围”，双方必须有一种紧迫感，并且愿意采取一些超常规的做法。值得强调的是，中国不要低估自己在引导和塑造中美关系方面的实力，完全可以通过采取必要的战略主动为两国关系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

双方可以同步采取一些修复性措施，为中美的协商谈判营造良好氛围。比如重新恢复两国在对方国家的总领事馆，减少在人员签证上的限制，停止对媒体记者的打压。

中美两国必须保持民间联系

裴敏欣（Minxin Pei）

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

稳定中美关系仍是当选总统拜登 2021 年议程中的头等大事之一，但要做到这一点双方必须恢复互信与合作。新一届政府应力求恢复文化、教育和人文交流，以修复这些年来两国关系遭受的结构性破坏。

几乎没人会质疑，即将上任的乔·拜登政府面临的最棘手外交决策，就是如何稳定与中国的关系，以便两国争夺地缘政治影响力，同时又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开展合作。与即将离任的认为同中国毫无合作空间的特朗普政府不同，当选总统拜登和他的高级国家安全顾问们似乎想制定一个更为均衡的路线，在气候变化和流行病等问题上寻求与北京合作，同时在贸易、人权和国家安全问题上保持实质强硬的立场。

一个未被充分重视的领域是文化与教育交流。当 2018 年双边关系开始恶化，中美民间关系就悲剧性地受到附带伤害。两国相互驱逐对方的记者，并限制留下来的记者的活动。出于对中国影响力的担心，华盛顿还将中国资助的孔子学院列为“外国使团”，大大减少了文化上的交流。由于唯恐将先进知识泄露给中国的研究生，美国收紧了签证发放。共和党议员无视美国文化交流的价值，终止了“和平队”的中国项目（自 1993 年以来，该项目已向中国派出 1300 多名志愿者）。

这些措施不会让任何一方在旷日持久的地缘政治较量中更有竞争力，但它们几乎肯定会加剧大众层面的互不信任和敌意。

美苏冷战与当下中美大国竞争的一个最重要区别是，冷战期间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几乎没有文化或教育上的联系，而美国和中国在过去 40 年里已经建立起广泛、深入和密切的民间关系网。

> “
>
> 当2018年双边关系开始恶化，中美民间关系就悲剧性地受到附带伤害。

维护这些关系网对于缓和两国政府竞争政策所造成的不信任和敌意至关重要。如果华盛顿和北京希望双边关系中有内在稳定器，那么民间交流必居其一。

> “
>
> 如果华盛顿和北京希望双边关系中有内在稳定器，那么民间交流必居其一。

三个数据可以说明文化和教育纽带是如何将两个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999 年至 2019 年，美国人收养了 82456 名中国儿童。1979 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学生来到美国学习，其中许多人留了下来。2019 年，美国高等教育机构接收了 369548 名中国学生，占美国国际学生总数的 1/3。2018 年，约有 200 万中国游客到访美国。

不过，由于中美之间的敌意和不信任与日俱增，两国政府必须在政治上采取果敢的措施，以弥补 2020 年造成的伤害。一旦新冠疫情被成功控制，文化和教育交流就应恢复到健康和互利的水平。

在修复两国文化和教育关系时，两国政府应优先选择能产生最多互利而政治代价又最小的措施，并推迟有可能引发过多争议的行动。

首先要做的应该是让美国记者回到中国，同时美国取消对在美中国记者的限制。两国都将从这一举措中受益。尽管在国家媒体驻美分部工作的中国记者无法在中国国内自由发表文章，但在美国更自由地工作会让他们更好地了解美国，改进他们的报道，并向中国读者传达不那么扭曲的美国情况。

> 首先要做的应该是让美国记者回到中国，同时美国取消对在美中国记者的限制。

让《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的美国记者回到中国，同时解除其他美国在华媒体受到的限制，还会让中美两国得到更多好处。美国关于中国的一些新闻报道确实经常批评甚至冒犯中国政府，但绝大部分报道还是专业、客观和充满信息量的，可以帮助美国公众更好地了解中国。如果没有这些知名媒体提供高质量的报道，大多数美国人也许就得从不那么可靠甚至是虚假的新闻来源获得有关中国的信息。

第二个迫切需要关注的领域是恢复“和平队”以及其他美国赞助的交流项目，如富布赖特项目，该项目作为美国制裁中国在香港实施国安法的一部分，于 2020 年 7 月被叫停了。预计拜登政府在人权问题上仍将保持强硬立场，但它完全有能力解除这一象征性的制裁，以推进华盛顿通过教育交流传播美国价值观的计划。不用说，中国应张开双臂欢迎这些项目的回归。

议程的第三项应是双方共同推动中国游客赴美旅游。受疫情重创的美国商界将因此获得经济利益是不言而喻的，但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拜登政府需要重申给中国游客的十年期旅游签证保持不变，并根据可行性研究，决定是否推迟执行特朗普政府最近对中共党员的签证限制。这些旨在阻止中国游客的限制肯定会逼迫北京采取一定程度的报复。如果能在这类签证限制问题上达成保全面子的妥协，北京方面就应该实施一项计划，以引导更多游客前往美国（这也有助于中国履行“第一阶段”协议中购买更多美国服务的承诺）。

最后，两国政府必须合作，确保中国学生在美国大学校园里继续受到欢迎。北京应当减少把美国描绘成不安全和充满敌意国度的反美宣传。对于不希望中国学生在美就读的科目，美国应该多一些透明，少一些武断，取消不必要和繁琐的签证限制，这类限制不仅打击中国学生的积极性，也会给需要这些学生的美国 STEM 研究生项目带来损失。

就修复过去几年中美民间交流所受到的破坏而言，这些都是温和而现实的步骤，也是对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的试金石。如果他们确实有意在未来几年内稳定双边关系的话，那么这些较易实现的目标就是他们为表达善意而必须首先达到的。

> 两国政府必须合作，确保中国学生在美国大学校园里继续受到欢迎。

为什么地方利益很重要

李成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

赵修业

美国州立法领袖基金会亚洲事务总监

在维护中美关系健康发展方面，地方和地方政府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新一届政府可以通过主动接触地方政府和向它们授权来获取积极的成果。

“

而地方与此形成的对照，对于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欲以一种新的、更连贯更有效的方式来应对中国的挑战。

尽管有关美国新政府对华政策的辩论过多地集中在了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竞争及有争议问题上，但是，只有从美国州和地方决策者的角度考虑问题才合乎情理，这些地方决策者们非常关心两国关系给自己的州、县、市带来的影响。

传统观点认为，中美之间进行战略竞争已是两党共识，然而美国的地方领导人却在努力挽救他们花了几十年时间为选民培育的中美经济、教育和文化关系。

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特别是随着过去两年与中国全面脱钩，中美双边关系以惊人的速度恶化了。不过，太平洋两岸的地方交流却基本上得以幸存，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繁荣发展。

例如，从 2018 年年中贸易战打响，到 2020 年初因为疫情暂时中止国际旅行，这中间有三位州长（均是共和党人）派贸易代表团访问了中国。与特朗普总统同属一个政党的州长们并不支持他与中国脱钩的呼吁，这一事实表明，除了国内政治之外还有其他因素在发挥作用。

华盛顿以外的观点

这些人的观点与华盛顿内部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在华盛顿，两党已经在国会就对中国采取对抗性政策达成一致。人们常说，国会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在所有问题上都有分歧，除了在中国问题上。而地方与此形成的对照，对于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欲以一种新的、更连贯更有效的方式来应对中国的挑战，就显得非常重要。新政府的对华政策要取得成功，需要在地方合作与战略竞争之间取得平衡。

地方政府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利益相关方和推动者，尤其当拜登政府以促进国际合作和公共利益，同时大力增进美国中产阶级利益为目标时，就更是如此。经过联邦政府以往的支持和引导，美国的地方领导人已经熟知成功的路径。在 40 多年的交往中，中美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已经结成 50 个姐妹省州和 200 多个姐妹市。美国的州政府在中国设立了 27 个代表处，比在其他任何国家都多。

由于商业和文化交流基本上独立于国家层面的政治，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地方往来迅速发展。强大和有针对性的地方合作为两国带来了就业和投资，给中产阶级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而单边行动却让地方一级的就业机会减少。

脱钩损害地方利益

即将卸任的特朗普政府的高级官员们普遍认为，包括教育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地方合作已经不再是通过接触让中国出现积极转变的希望所在。相反，它变成了恐惧和担心，担心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是要对美国的政治施加全面专制的影响，是要“武器化”中国的学者和学生，通过牺牲美国的利益来加速中国的崛起。

特别是，特朗普政府已经把地方上的交流作为脱钩的战场之一。美国国务院去年 11 月宣布，美国将退出 2011 年建立的中美省州长

“

经过联邦政府以往的支持和引导，美国的地方领导人已经熟知成功的路径。

“

受脱钩伤害的还包括南达科他州的大豆种植者，以及威斯康星州的人参种植者。

论坛，理由是担心中国的影响力。

虽然担心外国干涉美国的政治进程是合情合理的，但笼统地描绘中美两国的地方交流，有可能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脱钩”决定是由华盛顿做出的，但全国各地都感受到了痛苦。

例如在华盛顿州，每三个工作岗位中就有一个直接或间接与贸易有关，从新鲜樱桃，直到波音飞机，该州的出口在 2020 年下降了 65%。在密歇根州，即使去年春季新冠疫情暴发之前，密歇根大学和密歇根州立大学 2018-2020 年的中国学生数量也减少了 16%。受脱钩伤害的还包括南达科他州的大豆种植者，以及威斯康星州的人参种植者。

一个无党派倡议

中美自 40 多年前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两国之间的地方伙伴关系并不主要是出于政治动机，故亦不可能因为政治原因而结束。即使面对经济困难和关系恶化，在促进经济发展、应对气候变化、促进文化交流、在疫情期间提供个人防护装备等方面，州和地方层面对于中美合作也有广泛的两党共识。

当与中国的贸易投资往来排在美国各州州长资产负债表的最前面时，寻找合作途径对他们来说就变得至关重要。2011 年密歇根州在经济衰退中挣扎，州长里克·斯奈德抛开政治，选择中国作为其贸易代表团的第一个目的地，以考察美国的就业岗位为什么会流向中国，以及如何扭转这种趋势。斯奈德任期内派出的七个贸易代表团，为密歇根州带来 12.1 亿美元的中国新投资，给该州居民创造了 6304 个新的就业机会，使密歇根成为中西部利用中国投资创造就业岗位最多的州。尽管阻力重重，美国的州和地方领导人还是成功地把中国从一个产业外包目的地，变成投资和就业增长的来源。

哪怕在疫情最严重和脱钩压力日益加大的时候，州长们也在努力抵御政治压力，为他们所在的州寻找解决方案。在 2020 年 9 月北京举行的北美投资峰会上，田纳西州州长比尔·李通过视频连线，欢迎中国企业到他的州来。当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要求对与中国政府有联系的中国公司保持谨慎时，李团队的回应是：“好消息是我们招募的是公司，而不是国家。”当然，要有严格的审查程序来审查入境的外国投资，但地方的领导人不能因为担心含义模糊的所谓“外国影响”就切断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所有经济联系。

对于即将上任的新政府来说，也许没有什么地方性动议比气候变化上的伙伴关系更能为他们提供灵感了。2015 年洛杉矶市市长埃里克·加希提主持的美中气候领袖峰会，为两国达成一个实现《巴黎气候协定》的全国性双边协议铺平了道路。即使在特朗普政府让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时候，一

“

当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要求对与中国政府有联系的中国公司保持谨慎时，李团队的回应是：“好消息是我们招募的是公司，而不是国家。”

2021 年 1 月 6 日美国国会山骚乱之后，民主党人迅速启动并正式公布了对特朗普的第二次弹劾决议。（路透社）

个包括 25 名州长的两党团体仍然结成“美国气候联盟”，继续应对气候变化。美国的地方领导人已经带头并提供了路线图，拜登团队可以以此为基础，让应对气候变化成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之一。

地方外交可以造福中产阶级

认识到冷战式脱钩是不现实的，是会适得其反的，下届政府就有机会制定一个受到州和地方层面两党支持，并在战略竞争背景下为美国中产阶级谋求更多利益的精细的对华政策。

在对科罗拉多州、内布拉斯加州和俄亥俄州的中产人士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受访者对外交政策的看法与华盛顿的战略家们不同。从他们的角度看，有效的对华政策，是在反击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和防止全面的地缘政治对抗之间取得平衡，因为这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无休止对抗阻碍了投资，减少了就业机会。始终把地缘政治与地方合作分隔开来，才可以令美国中产阶级获得经济利益。

联邦政府同地方领导人之间更清晰的沟通和更好的协调，是地方外交取得成功的关键。国家与地方政府间实现有效沟通，有助于下届政府为地方领导人划定清晰实用的国家安全范围。笼统定义国家安全只会破坏跨境交易，侵蚀两国民众之间仅存的信任。

地方外交始于国内，需要政府对教育、基础设施和创新进行全面和持续的投资。两国地方层面的大范围脱钩无助于美国与中国竞争，因为它抑制了美国的经济增长，切断了美国人对中国同行的软实力影响与合作渠道。

如果联邦政府帮助为地方领导人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美国的地方外交就可以做到有效而自律。当美国的州长和市长们为了振兴本州或本市的经济与商业利益而前往海外时，他们的工作应该得到华盛顿的支持，而不是被过度审查和过度政治化。

通过与地方领导人主动接触和授权，下届政府可以推动中美地方外交发挥积极作用，从而让美国的中产阶级受益，并增强美国在与中国战略竞争中的影响力。

“如果联邦政府帮助为地方领导人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美国的地方外交就可以做到有效而自律。”

从火星到地球

金培力（Philip Cunningham）
独立学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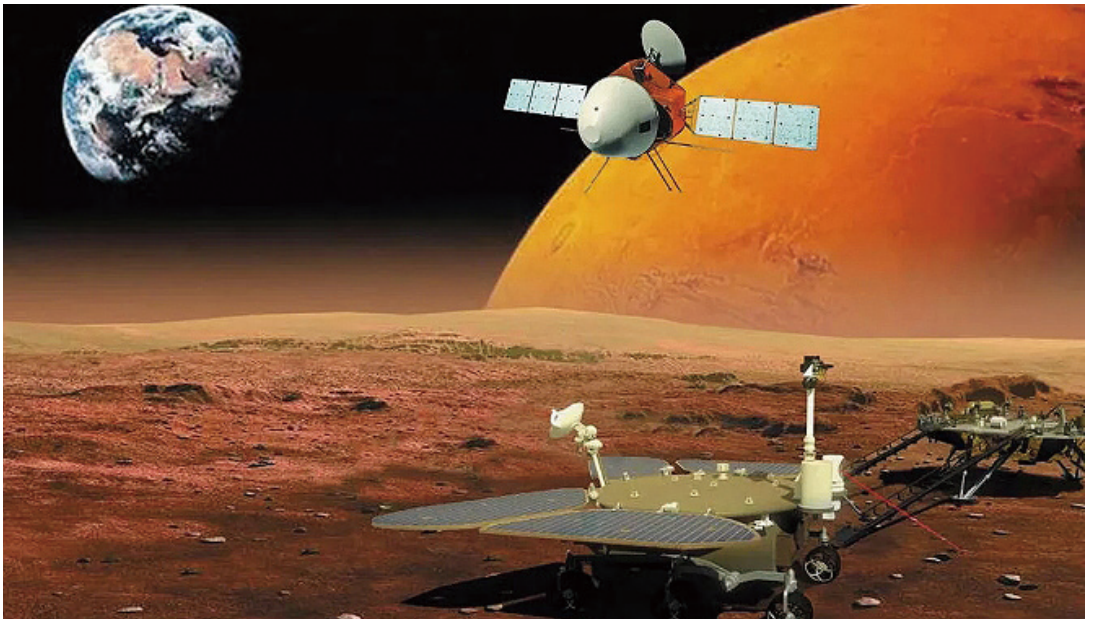
火星之旅需要不同国家和政府之间的国际合作，尤其是中美两国的合作。

很难想象，挤在狭小的宇宙飞船中进行长达半年的火星之旅而不发生任何口角，尤其多样性还是遴选机组成员的标准之一。这些成员来自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和非洲。

谁将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踏上那颗红色星球的人？

网飞的剧集《远漂》就是描绘这样一场奔赴火星国际之旅的不乏现实元素的科幻巨

▲ Netflix 电影《远漂》里的演员阵容看起来很熟悉。



▲ 2020 年 7 月 23 日，中国首颗火星探测器“天问一号”从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升空。“天问一号”火星探测任务是继“嫦娥系列”月球探测任务之后，我国又一重大太空探测项目。

制。更重要的是，该剧展示了这样的未来图景：各国不得不学习如何共处。

人们被迫挤在一艘飞往火星的小型宇宙飞船上，这让我们认识到在疫情肆虐的地球上有时易被忽视的一点：人类彼此合作不仅仅是为了繁荣，更是为了生存。

从技术层面说，探索火星是项艰巨的任务，也是成本极其高昂的任务，因此各国联手也许是唯一可行的途径。

> “
>
> **更重要的是，该剧展示了这样的未来图景：各国不得不学习如何共处。**

在暗示好莱坞需要在利润丰厚的中国市场分一杯羹的桥段中，故事就暗指如果没有中国资金的支持，大型火星探测项目将是不可想象的。

社会现实主义赢得了一分。

大国文明之间的各种小冲突贯穿全剧，有些冲突微不足道，有些则为推动剧情发挥巨大作用，但从起飞到最终踏足火星，始终贯穿着一条故事线来展现中美处理问题的不同方式。

这既是对我们所处世界的赞美，也是一种暗含的批评，即在太空发生的大部分难解分歧都可以在美中这两个地球最大国家的竞争关系中找到影子。但太空中的文化冲突是可控的，更重要的是它让探测任务完成得更好。

这部剧最开始将美国描绘成个人英雄主义的国度，中国则是遵从群体行为模式的集体主义国度，但这种令人厌烦的陈词

滥调在中途遭到挑战，并在剧终被彻底颠覆。

美中互动给原本松散、臃肿的剧本注入一些令人欣喜的紧张情绪。尤其是俄罗斯宇航员的阴谋诡计也发挥了不少作用。起码俄罗斯宇航员就比美国人更懂“中国方式”。

该剧设定在近未来，彼时的女性不仅“撑起半边天”，她们还在探索外太空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探测任务指挥官由希拉里·斯万克扮演，她是这部剧的主演，因此镜头也最多，但由邬君梅扮演的中国“下属”几乎抢走了全部风头。

邬君梅精细的表情管理令她可以几乎不牵动一丝面部肌肉就呈现出各种情绪，那是以一种内敛的方式展现复杂的情绪。乍看上去，她只是摆出一副扑克脸，但其实是在压抑内心的个人主义，传达角色内在的愤怒、极度的孤独、存在式的反讽和沉着的专业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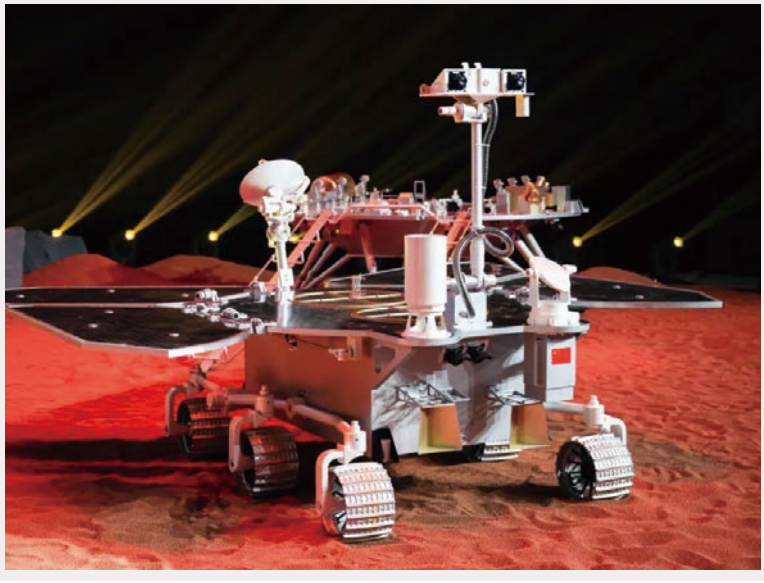
这两位女演员在性格上完全相反，而故事正是围绕这种对立展开，她们性格上的两极，隐喻着她们各自代表的文化的冲突。希拉里·斯万克饰演的艾玛情绪化，个人主义到近乎自私的地步，虽然必要时她也会坚强不屈。而中国宇航员 Yu 冷静，喜欢沉思。她尽职尽责地听从领导指挥，虽然内心也一直抱有怀疑和令人不安的举棋不定。

剧本设定让一个角色一直哭泣和情绪化，希望可以回到家人身边，而另一个则坚忍克己，为确保任务成功而不断做出牺牲。

正是基于此，邬君梅才是这部剧真正的主角，即便她在好莱坞的星途不如超级巨星希拉里·斯万克闪耀。

正如《滚石》所言：“每当故事转到 Yu 以及她作为一位中国女性身上背负的各种担子，就很难让人不希望她才是这部剧的主角，而不是仅仅作为我们实际上女主角的情绪平衡物出现。”

《远漂》本意是一部娱乐剧，但作为



中国国家航天局公布了中国首个独立的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的部分细节。火星车高1.85米，重约240公斤。它有六个轮子和四块太阳能电池板，能够在火星上以每小时200米的速度移动。

“

有志远赴美国求学的人，尤其是中国人，正日益面临令人忧心的歧视和随意被视为间谍的不公对待。

一部太空剧也有教育意义，它提示我们这些为琐事争辩不休的地球人，前进的最好方式就是合作。

美国控制疫情的努力一直被政治因素掣肘，但美国和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们通过紧急研究病毒的传染路径、缓解技术和可靠的疫苗经受住了考验。

虽然错误和挫折不断，但在科学和高等教育领域，美国依然是世界的灯塔（虽然美国民众自身对此越来越失去信心）。

但由于种族主义抬头，以及国家授权虐待外国人，这一优势正在被削弱。有志远赴美国求学的人，尤其是中国人，正日益面临令人忧心的歧视和随意被视为间谍的不公对待。

鉴于近年美国政治在这种怨恨、保护主义和脱钩意愿的驱动下大步倒退，世界灯塔的光芒眼下不再那么耀眼了。

“

作为一部太空剧也有教育意义，它提示我们这些为琐事争辩不休的地球人，前进的最好方式就是合作。

▲ 2020 年 5 月 27 日，SpaceX 携龙太空舱从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将美国宇航局宇航员道格·赫尔利和鲍勃·本肯带到国际空间站。

中美交流基金会简介

中美交流基金会于 2008 年在香港设立，基金会坚信，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发达国家，和中国这个人口最多、迅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两者的积极关系对于世界的福祉至关重要。基金会是一个非政府、非营利性的实体。

中美聚焦网简介

China-US Focus（中美聚焦，www.chinausfocus.com）由中美交流基金会主办，于 2011 年在香港成立，是目前全球唯一的专注中美关系的网络媒体。中美聚焦网站为中美问题的专家、学者、智库和意见领袖搭建了一个交流观点、理性探讨中美关系的平台，成为两国民众和世界了解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窗口。

CHINA US Focus IS PROUD TO INTRODUCE...

THE CHINA CURRENT
WITH JAMES CHAU

A new storytelling experience bringing you up close to the fascinating people shaping our shared global future.

Weekly videos and podcasts hosted by James Chau take you on an exciting journey to 'see' and 'hear' China first-hand.

Now available on all major digital and social media platforms
@thechinacurrent

ABOUT JAMES CHAU

James has earned a special reputation for his interviews with world leaders in politics, science and health. Amongst them, Nobel Peace Prize winners Jimmy Carter, Kofi Annan, Muhammad Yunus and Aung Sang Suu Kyi, and also Winnie Mandela, Arianna Huffington and Christine Lagarde. He serves as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Goodwill Ambassador and UNAIDS Goodwill Ambassador.